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著

付克新 / 译

吴默闻 / 校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美]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 著
付克新 / 译
吴默闻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帝国主义/(美)戴维·哈维著；付克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905-7

I. ①新… II. ①戴… ②付… III. ①帝国主义-研究 IV.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0268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新帝国主义

[美] 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著

付克新 译

吴默闻 校

Xin Diguo 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1.25 插页 3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9 000	定价	48.00 元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雷 鲁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 世纪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平装版序言

2003年2月15日，全球有数百万人参与公众示威，反对美英两国先发制人地对主权国家伊拉克挑起战争的趋势。那是一个惊人的时刻，也许全球公共意见在那一刻首次实现了某种形式的集体发声。在那次公众示威爆发前的稍早时候，我开始写作《新帝国主义》一书，并于当年4月巴格达被占领之前落笔。局势总是发展得太快，很多问题在当时看来是不确定的。vii

因此，我试图明确在混乱的表象之下发挥作用的潜在的力量，在宣传洪流中发现简单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并希望它足以应对实际结果的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这里我大胆提出观点，以我所建立的分析框架是强大而有效的为支撑，正如读者曾告诉我的那样。在阅读的时候，读者可以形成他们自己的特定理解，得出自己的结论，也许与我的结论相当不同：比如他们可以对权力运作的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或对美国的帝国传统的特殊形式有自己的认识，或对美国社会的“内在—外在辩证法”、掠夺行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区分、反抗运动的强度、策略和战略等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读者与作者理解不同，结论迥异，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只不过如此一来，难免会有发生诸多误解的危险，这就有必要对我们的立场和如何最好地展开论述进行开放式的讨论。viii

此外，我认为，华盛顿有深刻而充分的动力和理由来正确看待2015年1月可能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机构改革，而这些改革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彻底的改变。美国这艘航船，就像那些力图把世界各地的石油都带回美国的远洋巨轮一样，正朝着礁石撞去，正如我曾极力呼吁的那样——它单靠自己是很难避开悲剧的，更不用说掉转方向。在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帝国传统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动力机制之间的交叉权力领域，什么是可能的已经

受到了限定。这种限制条件的存在要求人们如查理一世（King Charles）告诉刽子手的那样：“很好地集中注意力。”^① 遗憾的是，太多人不希望这样做。我希望超越辩论（无论它们如何出色）的局限并致力于以下关键问题的探讨：在现有的多种限制下，未来都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政治经济选项。鉴于《新帝国主义》一书的诸多非英语译本已经或即将出版，读者们也已经有了很多反馈，想必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为开展辩论做好准备了。

① 很好地集中注意力，是对“concentrate the mind wonderfully”的直译，可意译为“务须慎之又慎”。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对刽子手提了很多要求，涉及刑具是否稳固、行刑时机和流程等方面，就是为了让刽子手尽可能小心谨慎，不要出纰漏，以消除和减轻可能出现的意外与痛苦。——译者注

第一版序言

2003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举办了克拉伦登演讲（Clarendon Lectures）。演讲选择的时机非常重要——尽管伊拉克战争看似迫在眉睫，但还没有真正开始，阻止战争的微弱希望仍然存在，这一希望继而被全球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所支持：2 月 15 日，伦敦和巴塞罗那都有大约一百万人走上街头，包括美国城市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城市也爆发了人数众多的示威。联合国安理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支持由尽人皆知的野蛮专制政体带来的威胁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观点。尽管遇到了这样的反对，在美国授意下，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仍然于 3 月 20 日开始，并得到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大力支持。当我在书中写到战争的结果时，尽管知道它毫无疑问是一场军事角力，但还不能看得很清楚。这场战争究竟是会以（或有可能以）殖民占领、由美国强制建立受其庇护的傀儡政府而终结，还是会以真正的民族解放而结束呢？

一方面，战事的迅速发展使我很难策划以“新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一系列演讲；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们给全球安全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又使得对它们进行深度分析十分迫切。因此，我决定尽我所能，透过变动的表象洞悉、预测形塑世界历史地理的一些深层趋势。这些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此危险而又困难的局势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的地域、文化和政治研究所，我参加了由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奥马尔·达波（Omar Dahbour）组织的以“帝国主义”为主题的长达一年的研讨班，并从中获益良多。我想感谢尼尔、奥马尔和研讨班的参与者们，我的很多想法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参与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研究计划的几位同事也对我的选题进行了自由评论，因此我还要感谢路易斯·莱尼翰（Louise

Lennihan)、唐·罗博特姆 (Don Robotham)、艾达·萨瑟 (Ida Susser)、简·施奈德 (Jane Schneider)、塔拉尔·阿萨德 (Talal Assad)，特别感谢迈克尔·布利姆 (Michael Blim) 和那些为我们题为“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讨论班完成打字录入的学生们。沿着我在这里构建的思路进行调整的观点，最初模糊地产生于我和乔万尼·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主持的联合研讨班上，因此我欠他一个特别的人情。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同事们，是他们邀请我重回故里并在一个最为恰当的时间和地方发表这些演讲。我还要特别感谢玛丽亚·凯卡 (Maria Kaika)、杰克·朗顿 (Jack Langton) 和埃里克·斯温吉道夫 (Eric Swyngedouw)，是他们热情招待了我并对我的课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安妮·阿什比 (Anne Ashby) 对我帮助很大，简·伯克 (Jan Burke) 在激励我完成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也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多年以来，我从与很多人的交流中收获了很多，在这里无法一一提及。希望在这些演讲中，我善用了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智慧与才识。

戴维·哈维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与石油有关	1
两个产油国的故事	5
美国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	7
一切关乎石油	10
第二章 美国的霸权何以形成	17
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	20
霸权	22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870—1945年	25
战后的美国霸权历史，1945—1970年	29
新自由主义霸权，1970—2000年	36
备选方案	43
地区性霸权和反霸权	47
第三章 资本束缚	52
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53
空间经济的生产	55
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59
资本循环	63
空间—时间修复	67
内部矛盾	72
中介机构的权力	73
国家及时复归	76

第四章 剥夺性积累	81
消费不足抑或过度积累?	81
马克思的保留	84
剥夺性积累	85
一切皆是偶然	89
私有化：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92
围绕剥夺性积累展开的斗争	94
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双重领域	98
作为剥夺性积累的帝国主义	104
第五章 从认同到强制	108
后记	125
延伸阅读	139
参考文献	142
索引	149

第一章

一切与石油有关

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¹ 主义国家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为达此目的，我选择了一个长时段的视角，并通过我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的镜头进行观察。我力图揭示在所有骚乱和动荡表象之下的深层变化，并由此开辟一个讨论的领域，来处理一些诸如我们何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局势并做出反馈等问题。

当然，任何人能够实际经历的最长时段就是我们的生命。我关于世界的最初理解，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在那个时候，英帝国仍享有极高的声望。整个世界对我来说似乎都是开放的，因为世界地图上有如此多的地方都被标注为红色——象征着一个日不落帝国。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英帝国的幅员辽阔，我还可以翻看我的集邮册——英国君主的头像遍布印度、沙捞越^①、罗得西亚^②、尼亚萨兰^③、尼日利亚、锡兰^④、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英帝国的力量在衰落，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崩溃。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加快，英国把全球霸权转给了美国，世界地图的颜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² 1947 年的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既给英帝国以重创，也标志着其开始走向终结。起初，我也接受了这一创伤性事件是“开明的”和“公平的”英国统治被非理性的本土激情取代并回复到过时偏见（一种由来已久但不限于英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典型事例。但是随着非殖民化斗争日益激烈，英帝国统治的丑陋与邪恶一面变得愈加突出。对于我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来说，1956 年英法试图

① 今砂拉越州，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译者注

② 今津巴布韦。——译者注

③ 今马拉维。——译者注

④ 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收回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其丑恶达到了巅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公开批评英法试图诉诸战争推翻阿拉伯领导人纳赛尔（Nasser）的企图，而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纳赛尔恰如现在西方人所描绘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都是危险和邪恶的化身。相比于战争，艾森豪威尔更推崇和平的遏制政策。公道地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美国的全球声望上升到领导者的地位，正如英法的急剧衰落一样出人意料。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我发现很难再去否认英帝国的急剧衰落以及它那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背信弃义面目了。

对于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从布朗克斯到牛津的年轻学生来说，上述事件显得非同寻常。马歇尔·伯曼曾写道，他是如何不能忍受那些“慵懒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父辈掌握英帝国和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是电影《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中的临时演员，无精打采地穿着晚礼服四处游荡（经常看起来像是睡过了头），过着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³或者说，他们表现得就像世界仍然由他们的父辈所支配一样。我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幕戏剧：英帝国已经终结，统治阶级的孩子们仍然依靠日渐贬值的信托基金过活，他们依然希望继承即将破产的公司……至少我知道我曾在这个世界上昂然前行”^[1]。我想知道，在美国本土失败的互联网公司随处可见，财务丑闻、股市暴跌损害着每一个人的养老金份额，以及突如其来的好战要求的情况下——正如《纽约时报》2003 年 1 月 5 日的头版社论《美帝国：适应它吧》^[2]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现在会有什么感受。对我来说，在一个帝国消亡的前一刻才去认识它所处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到了退休年龄才对公众宣布他的正式出生一样怪异。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极力重申此前的断言（在 2002 年 7 月 28 日的《纽约时报》中也是如此）：“美国所有的反恐战争都是帝国主义行为。这一点也许会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帝国。但是当美国士兵、间谍和特工遍布全球的时候，你还能把它叫作别的什么呢？”他认为，美国不能再偏爱“廉价”的帝国或希望避重就轻，它应该准备好担当更加重要和持久的角色，准备好为实现重大的改革目标而付出长期的努力。美帝国的观念在主流媒体上被突出地重点强调，其意义非比寻常。无独有偶，伊格纳季耶夫并非唯一宣扬这些观点的人。《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Max Boot）认为，“美帝国主义也许是对付恐怖主义的最佳良药”。他强调美国应该更具扩张性，理由是“阿富汗和其他一些陷入麻烦的国家当前迫切需要某种外来的开明管理方式，正如那些穿着马裤、戴着太阳帽同